

经济体制市场化与教育的伦理学困境

项贤明

安徽省芜湖市教育委员会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社会价值观念也在发生重大的变革。在新旧价值体系交替时期,教育者们常常要面对一系列的两难选择。围绕“教育能不能进入市场”所展开的争论,其本身就没有走出这一伦理学的困境。用伦理学的目光来审度教育的道德哲学问题。不仅是贴切的、必要的,而且有利于为我们进一步研究教育改革开辟一个更加广阔的理论视野。

一

一个历史的尺度,一个道德的尺度,每个反省人类历史的哲人,几乎都无法逃避这两种尺度的二律背反的煎熬。章太炎曾说过这样的话:“若以道德言,则善亦进化,恶亦进化;若以生计言,则乐亦进化,苦亦进化。双方并进,如影之随形,如罔两之逐景”。看似冷峻的哲言,却饱含历史大变革时期一个知识分子在历史尺度与道德尺度的夹击下内心的惶惑与痛苦。历史是一个狡狴的猫头鹰,总爱在黑暗中捉弄想看清它的人。也许这正是人类认识史的悲壮所在,九十年后的今天,在改革的大潮中,一代知识分子又遭遇了章太炎当年的那种两难困境。对此困境之苦体验尤深的,即是教育者们。

两难之一:教育要迅捷高效地适应社会需要,就必须进入市场;教育要促成至善的人性,就绝不可按市场原则行事。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的教育需求总是处在不断变动之中。教育要服务社会,提

高自身的运行效率和效益,就必须以市场调节机制来调控其内部结构。教育内容、教育方式和资源配置。作为一个社会子系统,只有通过统一的调节机制这一接口,教育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其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效能。同时,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是按照效益原则来配置资源的,教育系统要维持自身的生存并得到不断发展,非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效能不可。然而,正如康德在《教育论》中所说的那样,教育又不能只为了当前的利益,它更应当是“为将来人可能改良的一种境界”。教育在其本质上就有一种超越现实的理想性,它总是要按照一定的道德理想来提高一代代新的社会成员的人格发展水平,从而在推动历史朝着理想社会进步的过程中起到应有的作用。这种道德理想又总是有超功利的、利他主义的性质,与市场经济体制中的功利主义和竞争原则存在明显的冲突。是在市场调节机制的控制下不断培养出能赚取更多利润的人,还是根据人类的道德理想不断促成至善的人性?二者都是教育的社会责任。

两难之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作为社会劳务市场中的卖方,教育工作者也要通过出售教育服务来获得藉以维持自己与社会消费水平相适应的生活水准的工资;作为“真正天国的引路人”(杜威:《我的教育信条》),教师应有的自豪和尊严又不允许他同学生建立那样的佣员与主顾的关系。

在市场经济体制的商品社会里,劳动力也是作为商品在交换过程中实现其价值的。

作为劳动者,教师的劳动力也要进入社会的劳务市场系统参与交换。教师的工资,即其劳动力价格,要根据劳务市场中劳动力的供需状况围绕其价值上下波动。当教育界的劳动力价格过低时,就会出现师资流失现象,教师会离开教育系统去谋取其他较高收入的职位以维持自己与社会消费水平相适应的生活水准。这样,把教育界的劳动力交换活动纳入社会劳务市场,就可以根据市场调节机制合理地调整教师工资,实现整个社会人力配置的自然平衡。然而,这样一来,教师通过出卖劳动力为学生提供教育服务来获取生活资料,而学生是教育服务的购买者,师生关系于是便成了卖主与买主的关系。我们知道,师生关系是教育过程中最基本的人际关系,它在学生的社会化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在这里,教师是社会的代言人,是人类理想的化身,他担负着引导学生理解、掌握和追求现存社会道德准则和未来社会道德理想的责任。如果作为卖主,他只能根据买主的需要投其所好,不可能成为一个自觉的引导者并实践历史赋予的重要责任。一旦师生关系这一教育过程中最基本的人际关系发生了变化,教育领域的其他部分必将随之发生根本变化,人类文明的大厦也会因此而倾斜。为适应社会而破坏社会,这又是一个二律背反。

两难之三: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教育服务的价格也要服从价值规律,实行优质优价;为了保障社会成层竞争的公平合理,教育又只能以学生个人的发展水平为唯一标准,实行优才优育。

在商品社会中,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商品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而商品的价格又是由其价值决定的,它总是随着供需状况等众多因素的变化而围绕价值上下波动。生产优质产品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总是要多一些,因而其价格也理所当然要高一些。同样,优质的教育服务也要消耗更

多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以,教育质量好的学校就可以向其服务对象收取较高的费用。这一方面是商品经济规律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也是教育事业自身发展的需要。教育要提高水平,没有更多的投入不行。教育要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来从事教育教学,就应当给那些为教育付出高水平的复杂劳动的知识分子以更加丰厚的报酬。干好干坏一个样,在经济领域是不利于发展的现象,在教育领域同样是阻碍发展的。但是,在社会提供教育服务的同时,教育还在发挥着社会成层的功能。在现代社会里,一个人要获得较高的职位、声望和权力等,较高的学历往往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因此,在社会成员由较低层次向高层次流动的过程中,教育起着选择精英的作用。一般说来,就个人对历史的影响力而言,一个人所处的阶层越高,他对社会历史的影响力也越大。为了保证真正的优秀人才能够向高层次流动,教育只能根据个人的发展水平来选拔人才,不管这个人是否付出高额学费。显然,这是同等价交换原则相悖的。

两难之四:从教育在人的社会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来看,学校应当把道德教育放在首位;从学生的教育需求来看,学校又必须把社会急需的实用知识和技术的教学作为重点。

随着我国劳务市场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大中专毕业生通过劳务市场就业已成为必然趋势。这种发展趋势,已经并将继续影响学生对学校和专业的选择,进而还会影响学生对各类课程的学习兴趣。为了将来在社会上能够谋得一个好职位,学生的投考兴趣会集中指向某些社会劳务缺口较大。收入较高或工作环境较好的专业。要招收足够量的学生以维持和发展学校,学校就必须建设好社会“热门”专业,加强实用知识和技术的教学。这种劳务市场对教育的支配作用,势必会在实际上降低学校和学生对道德教育和

某些人文学科教育的兴趣。然而,青少年时期的教育对人的价值观念的形成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而且错误的价值观念一旦形成,往往比错误的知识技术更难矫正。同时,教育内容的全面性和完整性,不仅对个体的全面发展,而且对社会文化的平衡发展,都起着重要作用。所有这些,又从另一方面要求教育摆脱劳务市场的支配,按照长远的人类社会理想来培养各类人才。

二

教育所面对的一系列两难困境,似乎都是伴随着经济体制市场化而来的,我们能否因此把教育的伦理学困境归因于市场经济体制呢?实际上,人们把社会价值观念中的某些紊乱和消极现象归咎于市场经济体制,是一种社会认知上的归因偏向的表现。在价值问题上,我们都是主体,是行为者,因而我们总是倾向于强调情境的作用。经济体制的伟大变革把我国社会推入了一个根本转型的时期,随着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社会价值体系也发生着巨大的变革。在这一新旧价值体系交替时期,每一位社会生活的参与者都要面对一系列的价值观念上的选择,这就使得社会价值观念中原本存在的矛盾冲突更加突出地表现了出来。一个时期的社会价值体系的内在矛盾,确乎总是与其经济基础密切相关的,但仅以单纯的经济关系是无法完满地解释所有复杂的价值问题的。

首先,人类的价值哲学本身就是一个主客观矛盾的产物。社会公认的道德规范、生活方式、文化习俗等,都是人类社会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对人的社会行为的外在约束。它是人在社会生活中为自己创造出来的一个对立物。市场经济也好,计划经济也好,我们的价值体系始终是对立统一的。所谓道德教育,就是这样一个过程:为了使儿童成功地完成社会化以适应社会生活。教育

者一方面要帮助儿童建立正确的道德观念,即通过社会道德观念的内化形成超我,以帮助和监督自我严格按照道德标准行事;另一方面还要进一步帮助儿童学会自我道德评价,即学会清晰地感知自我,保持自我对本我的控制能力。因为人格内部本我、自我和超我的冲突是永恒存在的,所以人在价值问题上永远处于一种两难境地,教育的任务之一就是教会人们克制不合理的愿望作出正确的选择。我们前面提到的教师向其他高收入行业流动的现象,并非只有市场经济体制下才存在。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社会里,教师离开教育岗位流入行政机关、事业单位的例子不胜枚举。教师也是人,既有为社会奉献力量的理想,也有获取较高地位和较高收入的欲望。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给个人的流动机会很少,个人收入的差距也不大,因此师资的流失才不如市场经济社会里表现得如此突出。矛盾是存在的,只是处于蛰伏状态而已。

其次,教育本身也是一种充满矛盾的社会活动,这是当前教育所面对的伦理学困境的内部原因。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的全面发展的理想与现实社会历史条件的矛盾。教育要促成至善人性的理想与现实历史条件的矛盾由来已久。在古代社会,由于没有发达的社会分工,生产活动同认知活动、艺术活动和社会交往活动以朴素自然的形式融合在个体活动中;人性表现出原始的丰富性,但却不可能有自由充分的发展。孔子的“六艺”,既是对个体的全面教育,又是站在奴隶主阶级的立场上对人性的压抑。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社会化大生产的发达的社会分工加剧了人的片面发展,但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理想,就必须实施这种片面的教育,正如席勒所言:“在对人性存在的这种肢解中,个体虽然得不到好处,然而非此方式人类就不能取得进步。”(《美育书简》)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摆脱自发分工的历史条件

远未成熟,所以教育仍然要面对促进人性的完善与加强某些社会需要的实用技术训练的两难选择。二是教育自身的特殊性带来的矛盾。教育是一种以个体为对象的社会活动,它既要站在个体发展的立场上,促进个体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又要站在社会的立场上,按照社会的要求来培养人。这就象卢梭所说的那样,“必须在教育成一个人还是教育成一个公民之间加以选择”。教育一方面要追求人的全面发展的理想,另一方面也要根据劳务市场的供求状况为社会提供人力资源的开发服务。

再次,传统理性主义的社会发展观对人们的社会认知的影响,也是教育在价值观上面临两难困境的原因之一。在传统理性主义看来,社会发展是按照某种单一模式进行的。人类社会总是在理性的引导下,不断从低级到高级,从野蛮到文明,逐步达到完全符合理性的至善至美的境界。这种理想的发展模式是先定的理性的体现。按照这种模式,社会发展的过程就象是计算机运行程序一样。如果程序规定了要从市场经济走向计划经济,那么就不能有其他选择。对照程序,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是倒退,所以社会价值观念也相应地发生倒退。在这样的认识框架下,教育所面临的一系列伦理学困境,自然要归咎于经济体制的市场化。在这种成见的影响下,社会价值转型期的多元化选择被看作进步与倒退的选择,这就加剧了人们内心的痛苦。

马克思曾经说过:“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历史的发展是人的不断实践的结果。根本不存在任何固定的模式。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过程,就是人不断解放自己走向全面发展的过程。因此,只要是有利于解放生产力的社会变革,就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想的实现。历史的进程总是曲折的、多元的,教育要促成至善的人性,但丰富完满的人性要在历史的进步中逐

渐达成,而恶有时也是历史进步不可缺少的力量。恩格斯在批评费尔巴哈时曾经指出:“在善恶对立的研究上,他同黑格尔比起来也是很肤浅的。”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这里有双重的意思,一方面,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但是,费尔巴哈就没有想到要研究道德上的恶所起的历史作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我们应当看到,改革大潮冲垮了过去表面上的某种公平与秩序,也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效率与活力。教育理当为这种效率和活力作出自己的贡献。

三

经济体制市场化是有利于解放生产力的,教育要积极参与和推动这场改革。然而,教育作为一种社会活动有其特殊性,在这一领域里,我们还要注意现实与理想的统一。没有现实性的理想是空想,没有理想的现实则是缺乏动力的毫无希望的现实。任何时代的教育者都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按照反映其时代精神的理想人格塑造着一代代新人,这是人类文明的积累与进步的必由之路。教育不仅要适应现存的社会生活,而且还要发挥自己特有的社会功能改造社会,促进社会进步。杜威说得好,“社会对于教育的责任便是它的至高无上的道德责任。通过法律和惩罚,通过社会的鼓动和讨论,社会就会以一种多少有些机遇性和偶然性的方式来调整和形成它自身。但是通过教育,社会却能够明确地表达它自己的目的,能够组织它自己的方法和手段,因而明确地和有效地朝着它所希望的前进目标塑造自身。”(《我

的教育信条》)在改革的时代,我们更应重视发挥教育这种自觉的先导作用,促进社会朝着理想的方向前进。

第一,通过发展经济增加教育投入,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通过发展教育提高全民文化素质和道德水平,保障社会经济文化平衡健康地发展。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的确给教育带来了一系列新情况和新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还要靠经济与教育的相互积极作用,回避或阻碍这场改革都不是教育的正确出路。只有通过经济体制市场化激发起社会经济增长的活力,我国的教育事业才有可能在更加深厚的经济基础上获得真正长足的发展。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教育只能消极被动地适应经济体制的市场化,也不意味着教育可以放弃其理想性而对社会价值观念暴露出的问题熟视无睹。恰恰相反,教育对市场经济发展的最重要、最有意义的作用不在于通过职业训练开发劳动力资源,而是借助追求人的全面发展来弥补这种训练对人性的片面化。市场经济最需要的不是用竞争的、功利的价值观念来教育青少年,因为市场经济本身就具有这方面的影响力,它最需要的倒是学校加强对下一代的集体精神、利他精神、奉献精神等的教育,以维持社会价值体系平衡所必需的内部张力。尤其是在当前这样一个新旧价值体系交替时期,指导那些自己还没有足够的判断能力的青少年学生选择正确的价值观念。是我们教育工作者最重要的、不可推诿的社会责任。在一个社会里,较高的道德水平和良好的文化素养,无疑是经济改革与发展最为可贵的条件。这是教育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独特的不可取代的促进作用。

第二,借助劳务市场调节机制来维持师资队伍动态平衡;加强师德建设保证师生关系的纯洁和健康。

随着我国社会人力资源配置方式变革

的不断深化,教育系统的人力配置方式必将与整个社会的劳务市场体系接轨。教育工作者劳动力价格的调控机制也应当是市场机制,教师终将作为自由的劳动者参与劳动力商品的交换。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教师工资收入的公平合理,才能真正维持师资队伍的动态平衡,并且最终把优秀人才吸引到教育岗位上来。采用行政管理的手段,限制教师选择职业的自由,不仅不能在实际上阻止教师流失,反而会损害教师的权益和尊严,使其他寻求职业者对教育岗位望而却步。当然,借助劳务市场价格杠杆调节教育系统人力配置,使教师劳动报酬保持在适当水平上,这是一个渐进的改革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在进行这项改革的同时,我们还要加强师德建设,提高教师的普遍道德水平,保证师生关系这一教育过程中最基本的伦理关系的纯洁和健康。这不仅有利于维护教师的自豪感和尊严,而且有利于新一代社会成员正确价值观的形成。为了避免师生关系蜕变成买卖关系,教师的劳动报酬应当来自社会再分配,不应当直接取自学生。一种成功的市场经济体制,必有一套成功的富有激励性的社会再分配系统。教师,应当成为社会的雇员,他要向社会的文明进步负责,而不是向学生的学费负责。他应是社会理想的化身和代言人。

第三,改革现存教育结构适应社会需要,同时采取有效措施自觉促进和保护个体的全面发展。

培养满足社会经济文化发展需要的各类人才和促进个体的全面发展,是教育工作者的双重社会责任。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教育需求是变动不居的。要满足不断变化着的社会需要,就必须改革现存的教育结构,增强其灵活性。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建立一个社会教育需求反馈调节机制。因为教育是一种周期很长的产业,要想让现在确定的教育结构满足十几年后的社会需要,就象

是今天用高射炮瞄准飞机却要等明天才能开炮一样可笑。建立一个不断反馈社会教育需求的调控机制,让教育象导弹那样可以不断对自身作出修正,才能保证教育达到满足社会人才需求的目的。在站在社会需要的角度考虑问题的同时,教育还要为个体的全面发展着想,在现有的历史条件下,努力促进个性的丰富完满。教育不仅要代表现存社会的价值观念,还要代表未来社会的价值理想,因此它既要为社会生产服务,更要为人的真正幸福服务,物质生活资料的丰富不是人类幸福本身,而只是达成人类幸福的一个必要条件。

第四,掌握好公平原则与效率原则的合理应用,在保障全民受教育机会均等的同时,也要特别支持精英人才的成长。

全民享有均等的教育机会,这是全面提高我国国民素质的要求,也是一个现代化社会应当提供全体成员的福利。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就是公平原则在我国教育发展上的社会表现。但是,我们知道公平与效率往往是不能两全的。只讲普及不讲提高,也不能保证教育投入的较高效益,而高速度、高效率是现代商品社会的重要特征,要适应我国社会的现代化步伐,我认为目前的教育既要追求普及也要突出重点,各种层次的重点学校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应继续存在,从而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培养国家迫切需要的高、

精、尖人才。这里对人力物力的集中,主要渠道应当是社会再分配。办所谓的“贵族学校”,不仅破坏了公平原则,不利于下一代的健康成长,而且也由于其唯“财”是举而降低了教育投入的效益,接受重点教育的应当是那些真正具有发展潜力的优秀学生。高收入阶层的确有给教育以更多投入的责任,但这要靠征收个人收入调节税教育附加或对捐资助学者按一定比例免税等办法来实现。为了兼顾公平原则,接受重点教育者可以适当多支付些费用,但对来自低收入家庭的优秀学生一定要提供社会助学保障。

应当指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但它只是适应了现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而不是人类社会最理想的经济体制。在这种社会经济体制下,人类还要面对很多价值观念上的痛苦抉择,普遍的公平还不可能实现。追求高额利润刺激着人类对自然的占有欲的恶性膨胀在不断制造着仇恨、战争、强权和环境污染等灾难。人类需要一种全新的价值体系,需要更高智慧的指引。面对目前的伦理学困境,我们应当有信心,在社会主义价值观念的引导下,逐步建立一个完善的中国式的教育体系,达到席勒曾企盼过的“通过更高的教养来恢复被教养破坏了我们的自然(本性)的这种完整性”的境界。

(上接第54页)

原因有:学习态度不端正、学习动机不强等十项。

2、差生性别不同或年级不同,其学习不良的主要原因有显著差异。

3、差生所在家庭的类型不同、收入高低不同,其学习不良的原因均有显著差异。

参考文献:

①朱智贤著《儿童心理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

②石景麟等《儿童心理六十讲》,内蒙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P70—72。

③刘小明等《成就动机、自我概念与学生学业成绩关系的研究》,《心理科学》1991年2期,P18—21。

④季有荃等《家庭诸因素对儿童智商和学业成绩的影响》,《心理科学通讯》1989年6期,P50—52。

⑤张履祥《学习成绩与智力和人格的相关研究》,《心理科学通讯》1990年5期,P26—30。

⑥孟万金《儿童学习障碍的诱因与诊治》,《心理发展与教育》1990年3期,P190—193。